Globethics Repository



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 试论钱穆的经济文化观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Book chapter
Authors	陈, 泽环;Chen, Zehuan
Publisher	Globethics.net
Rights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CC-BY-NC-ND 2.5; se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5/legalcode)
Download date	2026-11-03 09:36:3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56929

20

MORALITY AND POLITICS LEAD ECONOMY – ON QIAN MU'S ECONOMIC-CULTURAL VIEW

Chen Zehuan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comparison between Sino-western cultures, Qian Mu, the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presents his unique views of economic-culture as "the economic life is the minimum grassroots of culture", "agriculture is ultimately predominant in human life" and "morality is the highest leader of culture", all which enlighten us that amongst the world of strong material desires and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we should insist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as the principal mea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harmony,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oftiness, and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ake a more reasonable and sustainable road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Qian Mu; Economy; Economic-cultural view

Chen Zehuan

Professor,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P. R. China.

第 20 章

经济应该由道德和政治来领导
试论钱穆的经济文化观

陈泽环

[内容提要] 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国学大师钱穆提出了其特殊的经济文化观："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启示着我们在当今人们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坚持把经济繁荣富强作为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走一条更合理、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钱穆；经济；经济文化观

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的“伦理的经济学”包括三大部分：经济本体论、经济文化和经济伦理学，其中“经济文化研究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秩序、存在解释及其与经济秩序、经济风格、经济实践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一个以“现代”和“后现代”相对照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作为文化”的图式，强调“为了应对自然资源有限和环境污染的挑战，人类必须从现代经济的扩张主义和累进主义的‘增长文化’中摆脱出来，走向一种内在增长的、扩张和收缩相平衡的经济文化”。[352] 显然，科斯洛夫斯基的经济文化理论，对于我们克服由现代经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矛盾和危机，是有启示意义的。而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经济文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学大师钱穆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阐发过的经济文化观也有类似之处。从而，为了实现当代经济与文化和生态相和谐的目标，除了大力吸取国外思想的积极因素之外，我们更应该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文化思想的智慧。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基于钱穆的《文化学大义》（1950 年）、《中国文化史导论》（1941 年）等文献，对其经济文化观及当代意义作一初步的探讨。

20.1 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

钱穆对其经济文化观的阐发，是从界定“‘文化’究是什么”开始的。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在强调了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的极端重要性之后，他指出“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

[352] 陈泽环：《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第 180 页。

面的整一全体'。"[353] 基于这一文化的基本定义，他进一步发挥："文化学是研究人生总体意义的一种学问。……人生意义，概括言之，有两大目标：一、是多方面之扩大与配合。 二、是长时期之延续与演进。此即中国《易经》上所谓的'可大可久'。……价值便决定在其意义上。愈富于可大可久的意义者，则其价值愈高。反之则愈低。"[354] 这里，钱穆表达了其对于文化的基本理解：与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相比，文化才是现代人类生活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文化尽管必须在每一个个人人生上表现，但有其超越于每一个个人人生之外之上的客观存在；因此，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之"可大可久"。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个人主义、当下主义、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国传统大群主义、历史主义、道德主义、生态主义的文化观，它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坚持文化的"集体"性、"大群"性，把是否"可大可久"视作文化的最高价值所在。

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观，钱穆首先区分了文化的三阶层、三层次。他认为，从人类文化的横剖面的角度看，即就人类文化的一般形式而言，"人生全体"可区分为三大类：第一是"物质的"人生，亦可说是"自然的"、"经济的"人生。由于人生本身即是一自然，人生不能不依赖物质支持，因此这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即文化的第一阶层。没有此最先一阶层，将不可能有此下各阶层。其次是"社会的"人生，或称"政治的"、"集团"的人生，这是第二阶段的人生，即文化的第二阶层，如家庭组织、国家体制、民族分类等，这一层次要求"人与人"相互间的安乐（安居乐业、安和乐利），来过一种集体的人生。第三阶层是"精神的"人生，或说是"心灵的"人生，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人生，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人生"。这里的文化三阶层，都各有其独特自有之任务与目的、意

[353]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4 页。
[354]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6 页。

义与价值："第一阶层之特有目的，在求生存，即求各个肉体生命之存在。第二阶层之特有目的，在求安乐，即求大群体生命存在之安乐。……安乐已超越存在，而同时又包涵着存在。第三阶层在求人类生活之崇高，实即仍在求安乐之崇高。……亦必包涵有安乐，乃始见其为崇高之真意义与真价值。"[355]

人生即文化的"三阶层"，对应着"三个世界"："人生必须面对三个世界。第一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的是'物世界'；第二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的是'人世界'；须到第三阶层里的人生，才始面对着'心世界'。"[356] 而人生即文化的这三阶层和三个世界的区分，由于不仅在宏观上与人文演进的三阶段相应，而且在微观上也与个人成长的三阶段相应，从而也就确定了上述文化三阶层之间的关系。"固然，没有存在，那有安乐、崇高可言？然而这只是一种反面消极的限制，而并非正面积极性的决定。没有第一阶层，不可能有第二第三阶层，……但有了第一阶层，不一定必然有第二、第三阶层。但有了第二阶层，则必然融摄有第一阶层。……这是人类文化三阶层递进递高，递次广大融摄的一条通律，可以用作衡量批评一切人类文化意义与价值之基本标准。"[357] 进一步说，人类文化三阶层，不仅其各自之目的不同，其所以完成此目的之方法特性亦不同："第一阶层的文化特性是'外倾的'，向外斗争的；第二阶层则是'内倾的'，向内团结的。但到人类文化到达第三阶层，那时则是'内外一体'，'物我交融'的，古今时间性的隔阂融和了，自然界与人文界的壁障也同样融和了。"[358]

总之，人生有递进的三阶层。第一阶层为"小我人生"，只求把外面物质来保全自己生命之存在与延续，其典型活动为经济。第二阶

[355]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10—11 页。
[356]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9 页。
[357]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15—16 页。
[358]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0 页。

层为“大群人生”，要求小我相互间的安乐，来过一种集体的人生，其典型活动为政治。第三阶层为“历史人生”，追求把握人类内心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使你心我心，千万年前的心，与千万年后的心，心心相印，融成一片。不仅有集体的广大性，而且有历史的悠久性，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内心安乐，无与伦比的，其典型活动为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特别是道德。在上述文化三阶层中，其中低阶层目的完成，转化成高阶层目的之手段。而高阶层目的之向往，并不毁损低阶层目的之存在。文化演进，正是人生目的之逐步提高。必待到达文化第三阶层之目的完成，才始是人类文化之完成。当然，“人类文化有时亦往往越过了第二级而直达第三级，此乃文化之过早成熟。有时则为着崇高而牺牲安乐，为着安乐而牺牲存在，为着高一级的目的而牺牲低一级，此乃文化演进中所遭遇的不得已的变态，这亦可说是文化中一种苦难。但文化亦常从苦难中跃进。若仅为低级目的而遏塞了高级的向往，则是文化之逆流与倒退。违逆人心，势不可久。文化三阶层之正常演进，应该是一个超越一个，同时又是一个包涵一个。”[359]

从经济文化观的视角来看，以上对钱穆文化三阶层思想的概括表明，相对于“政治”人生、“精神”人生，“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经济”人生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经济”人生，那么各个肉体生命就无法生存，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有了“经济”人生，并不一定必然会有以“大群体生命存在之安乐”（安居乐业、安和乐利）为目的的“政治”人生，以及以人类生活之崇高为目的的“精神”人生。因此，尽管“经济”人生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但它毕竟只是文化的最低基层，是人类实现和发展“政治”人生、“精神”人生的手段，即经济是政治和精神的手段，生存是安乐（公正和谐）和崇高的手段；当然，目的也离不开手段，

[359]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2 页。

崇高、安乐（公正和谐）不仅超越生存，而且也包涵生存，精神、政治不仅超越经济，而且也包涵经济。在此，基于其大群主义、历史主义、道德主义、生态主义的文化思想，钱穆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观。尽管无论其整个文化思想，还是其文化三阶层的具体论证，都不是无可质疑和指摘的，但笔者也不能否认，这一经济文化观毕竟既深刻地提炼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观念，又丰富了现代人类的经济文化思考，对于我们思考当代经济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处理好经济繁荣富强与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关系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20.2 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

在从人类文化一般形式的角度区分文化的三阶层，强调"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之后，钱穆接着从世界各时期各民族文化之已有业绩，即从人类文化的特殊实质角度出发，把人类文化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并提出了"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的命题。他认为，世界人类文化在源头上有三大类型：草原高寒地带的游牧文化，温带平原河流灌溉之区的农耕文化，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的商业文化。"而此三大类型又可再归纳为两类型。一是农业文化，另一类型则是游牧与商业文化。"[360] 至于把游牧与商业文化归为一类的根据在于，农业文化大体上自给自足，而游牧与商业，都向外依存。这种不同导致了农业和游牧、商业文化之间的一系列区别：农业民族是安定的、保守的，游牧与商业民族是流动的、进取的。农业社会和平相处，也散漫相处。"游牧与商业社会，必然是对内团结，对外斗争的。换言之，则是向外侵略的。……游牧人、商人全富征服感。不仅敌我对立，而且是天人对立，"[361] 注重工具。农业生产则不然，

[360]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5 页。
[361]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6 页。

天人合一，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力。因此，农业与游牧、商业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也不同：一是“天人交和”，一是“天人敌对”；一主“性善论”，一主“性恶论”；一主在我外面的是一片友情，一主在我外面的是一种敌意；一偏仁慈，一偏机智。

在初步概括了农业与游牧、商业民族文化类型及其宇宙观、人生观差别的基础之上，钱穆进一步分析两者经济观的不同，强调游牧人商人又特富于财富观：游牧民族，牛羊孳乳，几何级数；商业民族更是如此，资本愈雄厚，利润愈增高，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而且他们积聚的，都是可以向人交换的间接的一种价值符号，可以无限收藏，从而更加深了他们的欲壑，有了更想有，多了更想多。而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必须结合人意和天心；农民手中的是实际衣食所需，不待交换，亦难积存。“因此游牧商人的财富是符号的，农民的财富是实质的。游牧商人的财富可以激增，亦可以惨落；有恐怖，亦有希冀；时时有刺激，有兴奋。农业民族只懂生产，不懂财富；只知实物，不喜抽象；有恃无恐，但亦不奋发向前。一方的心灵常是跳落动荡；一方的心灵则常是沉著稳健。”[362] 总之，游牧商业文化的经济观和财富观起于内不足，故常外倾、趋向“富强性”，但往往“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归宿到“抽象化”。农业文化的经济观和财富观则起于内在自足，故常内倾、趋向“安足性”，但往往“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归宿到“实体化”。

上述所谓的游牧商业文化“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农业文化“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已经涉及到了这两种文化类型之间的比较和关系问题。钱穆指出，外倾的游牧、商业文化对自然主“天人对立”，对人类主“敌我对立”，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则易达到自然和人类的极限，即此种文化发展之顶点。“古代

[362]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页。

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363] 而内倾的农业文化主“天人相应”、“物我一体”，追求“天长地久，福禄永终”，成为人类最基本、最主要、最正常的生业和文化，以前如此，以后仍将如此。当然，农业文化先天的有其弱症。在古代，易于受游牧文化之蹂躏；在近代，则易于为商业文化所摧毁。因此，“在理论上，外倾型的观念，比较欠圆满，但在实践上，凭其战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临时的胜利，而终极则不免要失败。内倾型的文化，……远景虽美，抵不住当前的横风暴雨。于是人类文化，……累累地发生了无穷的悲剧。这是以往一部整个的人类史，要待我们从头来安排、来调整。”[364] 那么，如何在经济观和财富观的问题上，吸取游牧、商业文化的优点，克服其局限，既避免人对自然的掠夺，又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呢？钱穆的回答是：“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365]

当然，这种“人类终当以农业为主”的落实，即使仅就其现实的社会和技术要求而言，也是有许多条件的。对此，钱穆有清醒的认识。“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业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366] 这里，基于对游牧、商业

[363] 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06 页。
[364]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30 页。
[365] 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07 页。
[366] 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07 页。

文化“天人对立”、“敌我对立”、“空间扩展”、“无限向前”的分析和批评，钱穆指出了由“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的中国农耕文化对于实现生态平衡和维护世界和平所具有的极为重大的意义，实际上是从文化类型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经济生活与自然的关系、经济生活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人类经济生活在自然之中，不能与自然对立，而是要与自然实现和谐；经济生活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而不能让它过度膨胀，尾大不掉，无形中由经济来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号施令，导致战争和堕落等等。

而从理论上说，要确立“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的观念，在历史思想上就要破除几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单线进化论：“依西方人看法，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但中国人看法，则并不如此。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应该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展扩而附上一个工业，更加绵延展扩而又附上一个商业，但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367] 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只有中国的农业文化“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也不会在科学技术上“无控制的利用”，违背“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对于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 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抓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可能发展和利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我们来说，这样说合乎时宜吗？过去的苦难不正是由于中国是一种传统的农业文化国家吗？但是，如果我们超越现实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生活层面，从更高、高广阔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层面来思考问题，钱穆的这些命题就不是

[367] 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720—721 页。

什么“奇谈怪论”，而是具有生态智慧、和平情怀和审美趣味的远见卓识了。

20.3 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

基于其文化三阶层的“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观念，文化两类型的“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的思想，钱穆还从人类生活之诸多形态，即文化结构的角度，区分了“文化七要素”，得出了“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的结论，进一步阐发了其独特和深刻的经济文化观。在钱穆看来，可将人类生活之诸多形态分划成七个大部门，称之为“文化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并界定了其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和功能、意义与价值。关于经济这一要素，钱穆指出，它包括衣、食、住、行种种物质生活，相当于文化第一阶层；经济生活为人类文化之基石，但它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却是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影响甚大。但经济水准愈提高，它对人类全部文化体系所能贡献之意义与价值，并不相随提高，甚至会相反地愈降低。”[368] 经济有了相当满足即该就此而止。其他文化生活如文学、艺术之类，则是积极的，没有了初若不打紧，但这一类生活可以无限发展，没有限度的。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提高，并非即是文化总体价值之提高。物质生活进步，诚然是人类生活中一项重要的进步，但仅是一项重要的进步而止，因此人们千万不应该只凭物质生活来衡量全部人生。

至于科学，钱穆认为，近代西方文化所以能具有领导世界的力量者，就在其科学之发达；但是，在全部文化中，科学的地位和功能是有限定的。就科学的“实际应用”而言，其最大贡献都属物质经济生活范围，这方面的贡献也是消极的胜过积极的。就其作为“精神创造”而言，科学仅出于人类心灵中的理智，发明的只是科学真

[368]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33 页。

理、自然真理，而非人生真理。科学真理只告诉我们可能与不可能，必然与不必然，但不管应当与不应当。从而，“科学只能辅助人生，方便人生，但人生决不能由科学来作指导与决定。”[369] 若把它作为衡量全部人类文化体系之意义与价值之尺度，其必然的偏差也可想见。至于政治，指人群组合之种种法律、制度、习惯、风俗等而言。政治作为文化整体中的中间阶层，既有可能上倾把政治措施联系到第三（精神）阶层而接受其领导，也可能下倾把政治措施迁就于第一（经济）阶层而听其支配。在此，钱穆指出，除了基督教等的神权政治之外，西方的希腊城邦政治、罗马帝国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常不免有迁就第一阶层之下倾趋势。只有中国政治，最先便想把第三阶层来领导第二阶层，再由第二阶层来支配第一阶层，比较起来是最合理的。从而，“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370]

进一步说，面对物世界的科学，面对人世界的政治，都有内外之分；但“艺术、文学、宗教与道德，此四种要素，则没有内、没有外，只有一个上下古今、天下大同的‘心灵’，内外交融，凝成一体。到达这一境界，才算是真人生。”[371] 艺术重在欣赏，把我之生命及心灵，投入外面自然界，而与之融为一体。文学则把人生投向与我同等相类之“人世界”。它将发现在人中有我，而我在人中则融释了、化了、不见了，比艺术更真切。宗教是一件变相的艺术，变相的文学。人穷则返本。苦到临头，才懂得要皈依与信仰。但是，在中国人观念里，人生终极希望，乃道德，非宗教。道德是人生理想之实践。文学有所求，宗教亦同有所求，而道德则有献非求，它只求“尽其在我”，不更向外别有求。总之：“若把文化比作一棵树，第一阶层的经济，第二阶层的政治和科学，譬如阳光、土壤、水分

[369]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36—37 页。
[370]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41 页。
[371]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43 页。

与肥料，没有这些，便不能开花结果。文学、艺术才始是人生之花果。人类文化，必先安排好第一第二阶层，造成了一个环境，才有第三阶层之花果。宗教与道德，则是那一棵树的内在生机。缺乏了这生机，仅有阳光、土壤、水分、肥料也开结不出花果来。……所以我们将特提'道德'与'宗教'，作为人类文化体系中最主要的核心。"[372]

基于其文化三阶层、两类型的思想，在概括和分析了"文化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后，钱穆还提出了一个衡量文化合理性的标准，认为内倾型的，三阶层递升发展之合于正轨，七要素配搭之比较妥帖的文化，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文化，并由此充满自信地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完整性、稳健性和坚实性："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由道德精神具体落实到政治。这一种政治，亦该是道德性的政治。再由政治控制领导着经济。这一种经济，亦该是道德性的经济。至于文学艺术，莫不皆然，其最高领导者，还是道德精神。"[373] 当然，中国文化也自有其弱点。由于中国文化偏重政治、道德、人文一面，就不免偏轻了经济价值。此外，中国文化隔离科学太远，更成为一种虚弱之症。因此，现代中国人正该把西方人的宗教科学精神，来重新提撕自己的文化大本道德精神，来重新调整、重新充实自己文化的整个体系。中国因有它自己一套的道德精神，本可不要耶稣教，而实不可不要西方之科学。但是，这么做并没必要推翻中国文化传统里的道德精神，而是要认识到，必先以"人文科学为主"，自然科学始有规范、始有方向、始有意义、始有价值。更不能以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一切文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不仅体现为一种已有的

[372]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58—59 页。
[373]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75 页。

世界历史现实，而且也意味着当代人类的一种重大抉择。如果说，中国文化曾经重在政治、道德、文学、艺术诸部，西方文化所重在经济、科学、宗教诸部，印度文化重在宗教、艺术、文学诸部，各有其得失；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中国文化如何在强化经济、科学等因素的同时，发扬光大自身在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方面的优良传统，基于“天人相应”、“物我一体”的文化根基，更好地处理好文化三阶层之间的递升关系，处理好文化七要素之间的配搭关系，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虽然，在当代市场经济、物质主义的历史条件下，钱穆关于文化作为一棵树，经济、政治和科学譬如阳光、土壤、水分与肥料，文学、艺术是其花果，宗教与道德则是其内在生机，是人类文化体系中最主要核心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有一点“迂阔而疏于事情”，但面对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副作用日益加剧、工业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了地球生态极限的情况，不能不承认钱穆的经济文化观是包含着深刻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一家之言。尽管不能因此而拒斥其他经济文化观，但我们也必须为它保留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经济生活的看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艰苦朴素到能挣会花，在伴随着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如贫富分化过度、生态环境破坏、贪污腐败蔓延、文化庸俗低下等等。这就需要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对经济的看法问题，即经济文化观问题。面对把生产力水平视作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尺度，认定市场经济为配置资源最有效手段的时代潮流，面对有人强调“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好方式”、“幸福靠‘市场的逻辑’”[374] 的时髦观点，钱穆关于“经济人生

[374] 张维迎：“市场与企业家”，《东方早报》2012 年 5 月 22 日，《上海经济评论》特稿。

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的思想，似乎难以在当代人们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立足；但我们难道就可以因此否认，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文化观，钱穆关于“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的观点，不是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吗？实际上，这类思想不仅早已在许多西方思想家那里获得了共鸣，而且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也昭示着：经济繁荣富强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

参考文献：

陈泽环：《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版。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

钱穆：《钱宾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张维迎：《市场与企业家》，《东方早报》2012 年 5 月 22 日，《上海经济评论》特稿。

原文载于《孔子研究》2013 年第 1 期